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刘守华. 我与武汉非遗保护——《武汉非遗大观》序[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9(1): 32-34.

我与武汉非遗保护

——《武汉非遗大观》序

刘守华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395(2026)01-0032-03

我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学人, 1957 年从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 即留校从事民间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在这片人民文化事业的学苑中不懈耕耘数十年。20 多年前, 我在百名文化人关于抢救保护传统民间文化遗产的呼吁书上签名, 随后投身于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热潮之中, 今天喜见全国城乡非遗保护成果如鲜花般绽放, 心头喜悦之情不禁奔涌而出。因此, 当这部厚实而又精美的《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014—2024)》呈现在我面前, 相关负责人又郑重邀我写作序文时, 我便十分愉悦地应承了下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 2005 年由国务院发布通知正式启动的。其实, 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在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 以冯骥才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 更以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责任感, 对此作了震撼人心的申说与呼吁。《中国文化报》于 2002 年 2 月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冯骥才、刘魁立、乌丙安、刘守华等百名民俗名家、民间文艺学家在《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上签名, 著名学者季羨林、于光远、启功等也纷纷签名表示支持。专家学者呼吁, 立即在全国范围内抢救性地开展民间(俗)文化普查并编撰普查成果, 希望社会各界踊跃参加和

支持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这份呼吁书在当年全国两会上得到党和政府的积极回应, 在文化部(今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 由冯骥才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迅速开展了抢救保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保工程”, 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倡导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球行动相契合。中国于 2004 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 国务院办公厅于 2005 年 3 月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在全国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外文翻译词, 其实际对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文艺或民间传统文化。2006 年 1 月, 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以敏锐的眼光, 以文学院民间文学专业为主干, 组建了中国高校中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并由此和武汉市文化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受武汉市政府委托, 起草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条例, 2016 年经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付诸实施。我校民间文学专业的教学与学术研究活动也因及时向非遗工程靠拢而获得新的生机: 武汉市的木兰传说、伯牙子期传说(知音传说)、舞高龙习俗被选定为硕士、博士论文选题, 刘守华、陈建宪、孙正国等教授被聘为湖北省、武汉市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要成员, 参与非遗项目目录

收稿日期: 2025-09-11

作者简介: 刘守华(1935—), 男, 湖北仙桃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研究。

及传承人的命名、评审。

二

在本书所列的武汉市民间文学代表作中,首推大禹治水传说。大禹治水开启了中华文明的辉煌篇章,也奠定了荆楚大地、江城武汉的文明根基。大禹治水的古典神话多载于古籍,在非遗保护文化工程中搜求所得的大禹治水传说,多为民间传说在地化而留存的风物传说。如,传说大禹曾将云梦泽中的汉水导入长江,后人便将汉阳龟山东麓、长江岸边的大块矶石命名为禹功矶,以永世怀念禹王的功德,于是有了宋代苏轼的名句:“谁种殿前柏?僧言大禹栽。不知几千载,柯干长苍苔。”并在此建了一座禹王庙,供世人祭祀、怀念,使禹王崇高的形象走进民间文学、民间信仰之中。在非遗保护热潮中,武汉市政府兴建了大禹神话园,英雄治水的宏图 and 奔涌入海的长江相映成趣,赋予江城武汉独特的历史文化魅力。

除大禹治水传说之外,黄鹤楼及其传说故事也是武汉市的重要文化名片之一。在武汉,黄鹤楼传说是家喻户晓的口头传说,须联系壮阔的历史背景去看——吟咏古今英杰登临黄鹤楼写下的诗篇,了解传说中鲁班建黄鹤楼的巧手高艺,才能对这一在地化景观的意境有深刻感悟。我写过一篇短文,探求这一传说故事中所蕴含的神仙情结,引入吕洞宾这位八仙中爱干预俗事的仙人上场。他运用仙术,以井水制酒来答谢店家,又用橘皮在墙壁上画黄鹤,店家击掌,画中之鹤就可下地跳舞,为人助兴,于是酒店生意兴旺。可是人性中的贪欲难消,因此吕洞宾留下几句诗:“天高不为高,人心比天高,井水当酒卖,还嫌没酒糟!”黄鹤楼传说以对世俗钱财富贵的超脱来警醒世人,其中的神仙情结含有这样的意趣。

再说伯牙子期传说,它由中国音乐史上的一段佳话演绎而成,经明代著名作家冯梦龙写成小说后,便经久不衰。我在参与这一非遗项目的评审工作时才得知这一传说系由明代流传于汉阳地区的说书《贫贱交情》脱胎而来。就传说之原型而论,它追求知音之间心意相通的精神境界,联想到岳飞在《小重山》中的慨叹:“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可见“以琴弦觅知音”在人生中之可贵。我在研究中还发现有家居苏州的冯梦龙在贫困潦倒之际,远道前来拜会家居武昌的重臣熊廷弼,由熊致信当地官员解其困境的记述。这一历史线索更凸显了伯牙子期鼓琴结

知音的深远文化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下面再说木兰传说。木兰传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表现了效忠国家、敬老爱亲、追求平等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历史、文学、民俗研究价值。黄陂木兰传说历史悠久,早在南宋就设有木兰县,宋代古籍《太平寰宇记》提及木兰山,并引杜牧《木兰庙》作证,可见其根基之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张静教授在其所著《黄陂木兰传说与风物》一书中指出,湖北木兰传说可追溯到唐朝,至少明朝已经有了相关的民间信仰,持续至今。在黄陂的传说中,木兰生于大城潭,学艺于木兰山,葬于将军坟。围绕木兰生平演绎出大量地方传说,同时与相关自然景观和文化遗迹相结合,形成了大量风物传说。黄陂的木兰传说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传承人叶蔚璋十余年来收集了大量关于木兰传说的文献和物品,创办展览馆,吸引四方游客,对木兰传说的传承及木兰精神的弘扬作出了贡献。

三

武汉市还有一项别具风采的非遗项目——贱三爷故事。贱三爷属于全国少见的城市机智人物,其故事早期由沈远义集中采录,随后选编成集,武汉市还专门举办了关于城市机智人物的学术研讨会,我也撰写了几篇短文参与讨论。我认为,贱三爷故事将进城农民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待,塑造了贱三爷这个多才多艺、乐观豪爽、诙谐幽默的城镇劳动者形象。他是一个由乡村进入城市,在城里求生存、求发展的人物,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战胜困难,在城市里扎下根来,才有了“汉阳来的贱三爷”这句俗语。贱三爷故事反映了旧时代由乡村进入城市的民众所经历的苦乐艰辛,也折射出中国城乡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轨迹,由此生出的悲喜剧今天仍在我们身边不断涌现。

自我投身非遗保护的文化大潮以来,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见闻与亲身体验,使我对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项目产生了繁花似锦的深刻印象。经过这20多年的创新实践,武汉市在现代化大城市非遗项目保护与研究领域开拓了新格局,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提升了人们对武汉城市地域特色文化的认识。武汉市非遗是古今融合、根植于荆楚文化沃土,又与江汉平原广大乡土文化相融合而绽开的奇葩。

四

我大半辈子在中国民间文学学苑中耕耘不息,

特别是对民间故事情有独钟,因此在评说武汉市非遗项目时,也就侧重于民间传说故事的点评。武汉市作为我国重要的戏曲大码头,其戏曲艺术底蕴深厚,名扬海内外。我在湖北仙桃乡村度过童年,和广大乡亲一道,自小就喜爱看戏,特别是看常在乡村广场灵活演出的皮影戏、花鼓戏、楚剧等。楚剧中许多苦情戏故事曲折,用饱含深情的腔调唱起来,动人心魄。演《四下河南》时,常常是台上台下哭声连成一片,给我留下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2024年秋季,我在合肥休假,当时武汉周边许多乡镇在给老人庆寿时表演楚剧。我虽然是在视频中欣赏,见到那男女老幼熙熙攘攘挤在广场上看戏的情景,也仿佛置身其中,又回到几十年前的童年情景中。

楚剧以小戏居多,演出题材较少涉及金戈铁马、列国争斗,而偏重男女婚恋、家族伦理、社会公案,即使是一些古人古事,也常常以贴近社会现实生活的姿态再现于舞台,使民众倍感亲切。如董永卖身葬父,获得仙女的爱恋;吕蒙正乞讨赶斋,终致富贵显达;王宝钏苦守寒窑,终获大团圆;田氏母女因得到包青天的救助而沉冤得雪。这些传统戏曲中演绎的百姓疾苦虽已成过往,而今在舞台上重现,仍令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楚剧以讲述凡人小事居多,因此有时会受到轻视。我长期从事民间文艺研究,深切地感受到楚剧就是因其浅俗、贴近民众心理而拥有巨大活力的大众艺术。特别是其唱腔,悲苦却又深沉有力,诉说着穷苦得济、苦尽甘来的世俗传奇,撼动人心,魅力至今不衰。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著名艺术家、武汉歌舞剧院的老院长程云就曾多次发表赞扬楚剧艺术的文章,我至今不忘。在非遗保护文化热潮中,在武汉这个全国知名的戏码头,深深根植于楚地的楚剧依然充满活力。这朵乡野奇葩,更应受到我们的珍爱。

五

自非遗保护工程启动以来,20年间,在全国一盘棋的有力推动下,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不懈努力下,武汉市的非遗保护工作已取得累累硕果。这部《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014—2024)》中的97个非遗项目,就是饱含汉味、光彩迸发的非遗精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文化潮流,大大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理念,我们并不陌生,然而,当前民

间文化研究者的关注焦点仍偏重于少数民族文化及农耕文明,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些年来,武汉市相关部门拓宽思路,积极作为,从田野普查、采录认定,到申报评审,都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对待,让城市民间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有所突破,获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从这部书出发,联系我参与武汉市非遗研究评审活动所积累的印象,我以为武汉市已经开拓出现代化城市非遗保护工作的新局面、新境界。可以说,就总体文化境界而论,这些非遗项目正在实现武汉城市文化的古今融合。

武汉城市非遗构成与发展的一大特点就是城乡融合。武汉不是由历史悠久的王朝古都发展而来的城市,其近现代工业文明尤为发达,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从古今一体的大格局中走过来的。

我的老家在仙桃乡村,从家门前的通顺河下汉口十分便捷。20世纪30年代,家父刘承烈曾于武昌的湖北省财政人员训练班就读,而后在武昌营业税务所任职,并举家进城,在首义路的黄土坡处安家,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武汉遭遇日军轰炸,才返回沔阳老家。1953年,我考入位于武昌县华林的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直至退休,由此成为武汉市民。我对武汉市经济文化发展中城乡融合这一特点有十分深切的感受。在武汉市的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占了近一半,从汉绣、竹雕、木雕、剪纸,到油纸伞、青铜器的制作;从乐器、戏服,到中医疗法,许多技艺都是在乡村世代传承,而后才在城市扎根的。至于饮食方面的汉味代表作,如武汉过早,热干面、豆皮、汤包等,由周边乡村走进城市的就更多了。这些声名远扬的汉味技艺,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均被列入须加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从而大大拓展了我们的文化视野。传统技艺代表作在这部书中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它们作为城乡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生活文化,正因越来越受社会的关注而焕发光彩。

人们常将“大江大湖大武汉”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以为,完全可以用“广博浩荡文化城”作为此句的补充。我自投身武汉市民间文艺学领域以来,与此领域的同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谨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语,表达对同仁的感念。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 E-mail:qiangchen42@163.com